



清末民初軍國民教育體育思想的形成（上）

許義雄／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授

仁人志士開始有所獻策。茲略述如下：

一、先導期

清末鑑於國家積弱垂危，朝野上下，莫不以保種、保教、保國為首重，是以，強種圖存與武備教育思想，乃應運而生。

（一）保種為強國之本

光緒21年（1895），嚴復在天津直報發表「原強」乙文說：「蓋一國之事，同于人身。……今之中國，非就是病夫也耶。」（1）「東亞病夫」一詞，是否因此得名，不得而知。但嚴復力主，要使中國富強，必「以其民之手足體力為之基」，則仍是擲地有聲的宏論。這與張之洞「勸學論」所定救國救時的三大目標，在「保國家、保聖教、保華種」的想法已相去不遠。

清末民初的軍國民教育體育思想，因其時間的遽變，而有不同的呈現形成與內容。大致而言，在成形過程中，先有保種與武備教育思想為前導，而後有全民皆兵，軍國民之養成為後續，前後脈絡一貫，莫不基於洗雪東亞病夫之恥辱，強調尚武救國、強種強國的圖存理念。若依其演進看，則可分為第一、先導期：約自同治元年（1862）同文館設立後至光緒28年（1902）新教育制度的確立止，由派遣留學生，學習船堅礮利的軍事技術，到武備學堂一體學習兵操，為軍隊編練，兵操引入到身體鍛鍊的醒覺期，重在人人皆兵，保種圖存，尚武救亡思想的興起。第二、萌芽期：自光緒28年（1902）欽定學堂章程之訂定起至光緒31年（1905）止，主要特點在「軍國民教育」的概念開始提出，輿論並多所關注，



事實上，在軍國民思想形成過程中，清末的保種思想，除強調強種與強國之關係外，在身體觀方面，因所取立場互異，所以在保種的立論上，不無積極與消極之別。

1. 積極的保種論

清末提出積極的保種論者，可以嚴復的「鼓民力」，梁啟超的「新民說」及譚嗣同的「反靜主動論」為代表。進一步而言，這三個人的不同主張，除了單純或消極的保華種外，尤積極的試圖經由他們的主張，來強華種，以解除弱種亡國的危機，並達成強種強國的目的。試述如下：

(1) 鼓民力

「鼓民力」為嚴復於西元一八九五年所發表的重要言論「原強」中的一部分。嚴復列舉斯賓塞所提一國盛衰強弱之道表達自強觀。認為：「生民之大要三，而強弱存亡，莫不視此，一曰生氣體力之強，二曰聰明智慮之強，三曰德行仁義之強。是以西洋觀化言政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斷民種之高下。未有三者備而民生不優，亦未有三者備而國威不奮者也。」(2)

至於必須「鼓民力」的理由，嚴復說：「今者論一國富強之效，而以其民之手足體力為之基，此

自功名之士觀之，似為甚迂而無當。顧此非不佞一人之私言也，西洋言治之家，莫不以此為最急。歷考中西史傳所垂，以至今世五洲五、六十國之間，貧富弱強之異，莫不於此焉肇分。周之希臘、漢之羅馬、唐之突厥，晚近之峨特一種，莫不以壯佼長大，耐苦善戰，稱雄一時，而中土疇昔分爭之代，亦皆以三河六郡為取天下先資。顧今或謂火器盛行，懦夫執靶，其效如壯士惟均，此真無所識知之論也。不知古今器用雖異，而有待於驍猛堅毅之氣則同。且自腦學大明，莫不知形神相資，志氣相動，有最勝之精神而後有最勝之智略。是以君子小人勞心勞力之事，均非體氣強健者不為功。此其理吾古人知之，故庠序校塾，不忘武事，壺句之儀，射御之教，凡所以練民之筋骸，致民血氣者也，而孔孟二子皆有魁桀之姿。

彼古之希臘、羅馬人亦知之，故其阿克德美（柏拉圖所創學塾）之中，莫不有津蒙那知安（此言練身院）屬焉，而柏拉圖乃以駢脅著號。至於近世，則歐羅化國，日鰓鰓然以人種日下為憂，操練形骸，不遺餘力，飲食養生之事，醫學所詳，日以精審。此其事不僅施之男子已也，乃至婦女亦莫不然。」(3)

嚴復之主要觀點，可歸納為：

- ①手足體力為一國富強之基。
- ②君子小人勞力之事，非體氣強健不為功。
- ③中外古代庠序校塾，不忘武事。
- ④近世文明先進國家，以操練形骸，防人種之日下。
- ⑤重視飲食養生之事。
- ⑥上列諸端，男、女同等重視。

就此而言，嚴復列舉古今中外實例，說明對男、女筋骸之鍛鍊，血氣之鼓勵，均極重視，尤其相信操練形骸，足以免除人種之日下。嚴復翻譯的斯賓塞的「群學肄言，學波第八」中說：「故民形幹肫庫，而羸病多有者，其于群道非細故也。且其害不僅見於健男子之多死亡也，自精壯丁男，皆從軍旅，故田野犁鋤之事，不得不資之婦人，勞苦既過，筋力遂衰，所乳之兒，種亦日下，此又驗於法國而且其果然者也。」(4)並使一國富強，因而力倡「民力」之重要，已昭然若揭，自不待言。

(2) 造「新民」

梁啟超於戊戌政變後，流亡日本，當時，正值明治維新的三十年代，各方面都顯得朝氣蓬勃，特別是大量譯介西方書籍，開啟民智，不遺餘力。梁

氏置身其間，不無所感，乃於光緒28年(1902)，正月創辦「新民叢報」，並發表「新民說」乙文，旨在探求中國國民腐敗墮落的原因，並與其他發達進步國家的國民相比較，使國人知受病所在，俾能自勵奮發，圖謀振奮。梁氏指出，中國民族之缺點，在缺乏公德，缺乏權利義務觀念，缺乏進步觀念，缺乏冒險進取精神，缺乏合群、自由、自治、自尊，缺乏尚武精神，缺乏毅力，他認為這些傳統民族性應該徹底革新，才能抵擋列強的帝國主義。所以主張，欲求中國的宏富尊榮，新民之道，不可不講。其中，針對中國之文弱體質，梁啟超則提出發人深省的看法，他說：「世人之恒言曰，野蠻人尚力，文明人尚智，嗚呼！此知二五而不知一十之言，迂遍而不切於事勢者也。羅馬文化，燦爛大地，車轍馬跡，蹂躪全歐，乃一遇日耳曼森林中之蠻族，遂踣蹶而不能自立，而帝國於以解網，天當日羅馬之智識程度，豈不高出於蠻族萬萬哉，然柔弱之文明，卒不能抵野蠻之武力，然則尚武者國民之元氣，國家所恃此成立，而文明所賴以維持者也。俾斯麥之言曰，天下所可恃者非公法，黑鐵而已，赤血而已，寧獨公法之無足恃，立國者苟無尚武之國民，鐵血之主義，則雖有文明，雖有智識，雖有眾民，



雖有廣土，必無以自立於競爭劇烈之舞台。」(5)又說：「嗚呼！我神明之華胄，聰秀之人種，開明之文化，何一為蠻族所敢望，顧乃踐踏於鐵騎之下，不能一抑首伸眉以與之抗者，豈不以武力脆弱，民眾懦怯，一動而輒為力屈也。藐茲小醜，且不能抗，況今日迫我之白人，挾文明之利器，受完備之訓練，以帝國之主義，為民族之運動，其雄武堅勁，絕非匈奴、突厥、女真蒙古之比，曷怪其一敗再敗而卒無以自立也。中國以文弱聞於天下，柔懦之病，深入膏肓，乃至強悍性成馳突無前之蠻族，及其同化於我，亦且傳染此病，筋弛力脆，盡失其強悍之本性。」(6)

中國雖有聰秀之人種，開明之文化，卻因民氣懦怯，一敗再敗，而無以自立。是以，尚武不止是國民之元氣，更是國家所恃以成立，文明所賴以維持，尤為種族足以延續的保障。所以，梁啟超舉德皇威廉二世視學柏林小學之勅訓：「凡我德國臣民，皆當留意體育，苟體育不講，則男子不能擔負兵役，女子不能孕產魁梧雄偉之嬰兒，人種不強，國將何賴。」(7)說明了強種與強國的道理，更在與女學的文章中提到：「……各國之以強兵為意者，亦令國中婦人，一律習體操，以為必如是，然後所生之

子，膚革充盈，筋力強壯也，此亦女學堂中一大義也。今之前識之士，憂天下者，則有三大事，曰保國、曰保種、曰保教，國嗚呼保？必使其國強，而後能保也。種嗚呼保？必使其種進，而後能保也，進詐而為忠，進私而為公，進渙而為群，進遇而為智，進野而為文，此其道也。教男子居其半，教婦人居其半，而男子之半，其導原亦出於婦人，故婦學為保種之權輿也。」(8)

種進，而後能保種，種保而後尚武之新民可期，有尚武的新民，則中國當可自立於競爭劇烈之舞台。這無疑是近代中國有識之士倡議保種保國的共同信念。

(3) 動以強身強種

清末強身強種的愛國思潮中，譚嗣同的「反靜主動論」(9)，值得重視。譚嗣同在其所撰「仁學」乙書，對「主靜論」者多所指責。他說：「西人以喜種而霸五大洲，馴至文士亦尚體操，婦女亦侈游歷，此其崛興為何如矣，顧哀中國之亡于靜。」(10)又說：「主靜者情歸之暮氣也，鬼道也。」(11)所以，他說：「惟靜故情，情則愚；惟儉故陋，陋又愚。兼此兩愚，固將殺盡含生之類，而無不足。故靜與儉，皆愚黔首之慘術，而擠之於死也。」(12)因此



中心論題



，他提出：「天行健，自動也，天鼓萬物，鼓其動也。輔相裁成，奉天動也。君子之學，恒其動。……夫善治天下者，亦豈不由斯道矣！夫鼎之革之，先之勞之，作之興之，廢者舉之，敝者易之，飽食煖衣而逸君，則懼其淪於禽獸；鳥知乎有辜耳者出，言靜而戒動，言柔而毀剛！……以自遁而苟視息焉，固亦術之工者矣；鳥知乎學子術焉，士大夫術焉，諸侯王術焉，浸浸淪淪而天子亦術焉，卒使數千年來成乎似忠信似廉潔一無刺無非之鄉愿天下！言學術則曰『寧靜』，言治術則曰『安靜』。處事不計是非，而首禁更張；躁妄喜事之名立，百端由是廢弛矣。……力制四萬萬人之動，繫其手足，塗塞其耳目，盡驅以入契乎一定不移之鄉愿格式。夫群四萬萬之鄉愿以為國，教安得不亡，種類安得可保也！」
——(13)

譚嗣同的思想，崇尚「動」，對中國自古以來不知求變的「柔」與「靜」，害得中國成一四萬萬人之鄉愿國，使得教難以為保，種類幾近於亡，提出了強烈的批判，所以力倡動以強身保種。

譚嗣同並認為，學習拳術、射術、劍術，亦足以伸民族之精神，倡勇敢之風氣。所以，力主多參與身體活動，以養成「威力、奮迅、勇猛、大無畏

、大雄」的氣質，使中華民族能雄猛剛強。甚至，他從人體結構及生理組織，暢論運動對強身健體的重要意義，藉以闡述其「主動反靜」的道理。比如他在「石菊影廬筆識·思篇」中說：「動，陽之發也。靜，陰之斂也。全，陽之炎也。血，陽之潤也。乘奔車，轆巨石，動極也，于血則能流通，而不能靜細，其氣勝則流也。」
——(14)

事實上，譚嗣同針對當時民族危機，曾疾呼：「當知此堂堂七尺之軀，不是與人當奴僕，當牛馬」的壯志豪語，與顏元的「一身動則一身強，一家動則一家強，一國動則一國強，天下動則天下強」的觀點，則頗有異曲同工之妙。蓋顏元之所以力主動以強身強國，乃在破除千百年傳統靜坐主敬，清談心性，八股帖托，參禪禁欲等流弊惡習，以及導正重文輕武，重性輕形，重講輕行，重精鄙粗等偏見。
——(15)

2. 消極的保種論

在強種強國的思潮中，除了鼓民力、育新民及動以強身之主張外，揭禁禁早婚，戒纏足及禁鴉片，以保種保國者，亦能蔚為風尚，為時人所重視，分述如下，藉供參考：

(1) 禁早婚



晚清早婚盛行，蓋以「吾國為父母者，以嗣續為重，無後為罪，故多有年未二十之青年男女，即為之成婚，以圖早了男女之孽債，卸家事之權責，而享抱孫之樂，供晚景之娛。夫豈知因人之謬見，而貽青年莫大之害，種國家無窮之禍耶。」⁽¹⁶⁾嚴復對早婚之害，亦曾加詳論，他說中國人「徒以地大人多，滅之不易，故得須臾無死耳。」⁽¹⁷⁾並說，中國人雖居亞洲黃種人一半以上，但非天時地利之美，亦非養生息之宜，實由于文化未開，民之嗜欲重，而慮患輕。他說：「嗜欲重，故亟亟于昏嫁，慮患輕，故不知予籌其家室之費而備之。所以，所生之子女，飲食粗弊，居住穢惡，教養失宜，生長于疾病愁苦之中，其身必弱，其智必昏。他日長成，亦必有嗜欲而無遠慮，又莫不亟亟于嫁娶，于是謬種流種，代復一代。」⁽¹⁸⁾

嚴復因恐早婚招致滅種，特別提及：「夫此群中均身體弱知識昏之人，則其人愈多，為累愈甚。于是雖有善者，必為不善者所累，而自促其生。積數十人或數百人以累一人，是不啻以勤儉自立之人，受役于遊惰無業之人也。而有志者先死，因而劣者反傳，而優者反滅。然若優者盡死，則劣者亦必不能自存，滅種是矣。」⁽¹⁹⁾

有關早婚之弊害，在諸多時論中，以梁啟超之「禁早婚議」最能發人深省。梁啟超引經據典，說明早婚有害養家、有害修學、有害國計民生，其中，尤其以早婚之害於養生，害於傳種，更是語重心長，痛加指陳。梁啟超說：「少年男女，身體皆未所熟，而使之居室，妄斷喪其之氣，害莫大焉！」⁽²⁰⁾又說：「年少者，其智力既稚，其經驗復淺，往往溺一時肉慾之樂，而忘終身痼疾之苦，以此而自戕，比比然矣！」⁽²¹⁾因此，梁啟超認為，我中國民族，無活潑之氣象，無勇敢之精神，無沈雄強毅之魄力，原因雖非一端，早婚卻難辭其咎！他說：「一人如是，則為廢人，積人成國，則為廢國，中國之弱於天下，皆此之由。」⁽²²⁾尤其在早婚有害傳種的立論中，特別指出：「一家之子弟厄弱，則其家必落，一國之子弟厄弱，則其國必亡。昔斯巴達人，有產子者，必經政府驗視，苟認其體魄為不合於斯巴達市民之資格，則隘巷寒冰，棄之不稍顧惜，豈酷忍哉？以為非如是，則其種族不足以競優勝於世界也。」⁽²³⁾又說：「中國民數所以獨冠於世界者，曰惟早婚之賜；中國民力，所以獨弱於世界者，曰惟早婚之報。」⁽²⁴⁾但民族所以能立於天地者，不在量多，而在質強，梁啟超也論之再三。所以，他



說：「故自今以往，非淘汰弱種，獨傳強種，則無以復延我祖宗將絕之祀。昔賢所謂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正此之謂也。一人一家無後，猶將為罪，一國無後，更苦之何？欲國之有後，其必自禁早婚始。」(25)

(2) 戒纏足

清末反對女子纏足運動，除一部分因女權思想抬頭外，另一種重要的推動因素，即為強國保種思想的影響，具體而言，如梁啟超的變法，自強論及纏足論，都足以說明，反對纏足運動，不僅止於單純的女權解放運動的提倡而已。他如嚴復的「母健而後兒肥，培其先天而種乃進」(26)的主張，也無不是強國強種理念的延伸。

事實上，以當時反對纏足的形式看，或著文發為輿論，公開嚴厲批評纏足之不當；或相率組織天足會或不纏足會，積極宣揚放足之必要性，以擴大影響層面，達到突破陋俗，維護女性之天足與尊嚴。而其基本之觀念，或倡纏足之害於衛生、美感、行動操作，或力主纏足貽笑各國，堪稱國恥者不一而足，其中，以纏足害及人種足以動搖國本者，勿寧是思想的主流之一。

當然，戒纏足的思想源起甚早，但付之有組織

的推動，應是康有為於光緒8年(1882)謀創於廣東的不纏足會為最早。其後，經康廣仁的努力鼓吹，不纏足會終於在光緒20年(1894)組成。(27)張之洞亦支持反纏足運動，並於光緒22年(1896)親撰「不纏足會敘」提及：「今世士君子為中國謀富強計安危者，會中國民數，率皆曰四萬萬人哉？山澤民數，陰陽不齊，以男女各半為通率，禹跡九州之內，自荒服狹鄉，極貧下戶外，婦女無不纏足者，農工商賈，略漁轉移職事之業，不得執一焉！或坐而衣食，或為刺繡玩好無益之事，即有職業者，羸弱傾側，距躍欲曲，不能植立，不任負載，不利走趨，所作之工，五不當一。與形而廢之，幽而禁之，等是此四萬萬人者，已二分去一，僅為二萬萬人。：，言其害於家病其國者：不任職事，家食自窘，一也。貧者困於汲譽抱子，富者修飾愈盛，疾病愈多，終身若負械而行，不能自脫，家政廢，醫藥繁，二也。水火兵亂，不良於行，不能逃免，三也。尤酷者，人子之生，得父母氣各半，其母既殘其筋骸，痺其血脈，行立操作，無不勉強，日損無已，所生之子女，自必脆弱多病。噫！吾華民之稟賦日薄，軀幹不偉，志氣頹靡，壽命多夭，遠遜歐美各洲之所謂不道，兼而有之，此其可怪，殆有甚於吸洋藥



者矣！……，吾不惟傷此中華二萬萬婦女，廢為閒民，僂民也，吾甚懼中華四萬萬之種族，從此鬼瑣疲蕭，以至於漸滅也。」⁽²⁸⁾光緒24年（1898），康有為以廢除纏足為其變法要項，上奏光緒帝頒禁婦女裹足令

：「夫則足者，為古肉刑之一，……女子何罪，而自童幼，加以刑，終身痛楚，一成不變，此真萬國所無，而尤為聖王所不容者也。……血流不流，氣息污穢，足疾易作，上傳身體，或流轉子孫，奕世體弱，是皆國民也，羸弱流傳，何以為兵乎？……以國之政法論，則濫無辜之非刑；以家之慈恩論，則傷父母之仁愛；以人之衛生論，則折骨無用之致疾；以兵之競強論，則弱種展轉之謬傳；以俗之美觀論，則野蠻貽誚于鄰國；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乞特下明詔，嚴禁婦女纏足，其已裹者一律寬解，若有違抗，甚夫若子有官不得受封，無官者其夫亦科鍰罰，其十二歲以下幼女，若有裹足者，重罰其父母。」⁽²⁹⁾

要而言之，清末戒纏足運動，不止是民間極力呼籲，官方也雷厲風行，甚至不止是婉言相勸，而且也訴諸於法，足見期望於因戒纏足而能臻於保種強國的殷切。

(3) 禁鴉片

清末知識分子，因感於民族危亡，反省到滅種之大患者，除纏足外，常舉吸食鴉片，而大加張伐。所以，為救種族之滅亡，戒煙禁煙，自然應運而生，各地的戒煙會、戒煙局所，也就到處林立。

有關鴉片之害，下面志剛的意見，足可代表：

「鴉片流毒，甚於瘟疫傳染之害，舉世皆知。……以堅船利礮以力服人之兇燄，猶不若鴉片毒害之深。」

「(30)徐勤也於『戒鴉片煙會序』文中，痛陳吸食鴉片嚴重危害種族之存續。他說：『形羸骨削，面異人色，舉動孱弱，有如土木，傷於身矣；破室蕩產，流於匈盜，妻孥寒餒，呼號無告，害於家矣；掃厄之巨，敵於絲茶，國用日蹙，民力彌困，損於國矣；凡百衿纓，同羅斯毒，學尚廢弛，等於土番，弱於教矣；妄于大禁，陷於敵刑，鉗受毒物，鄙為異類，辱於敵矣。若夫官吏則誤公，農圃則失時，工商則廢業，行陳則弛勇，族里所不齒，戚友所擯棄，區區之事，靡可縷數。嗚呼，中洲靈淑之氣，億兆神明之胃，豈天留此鴉毒之物，以賊其種類者哉？』」⁽³¹⁾

當然，因對鴉片流毒之體認，乃不免對銷售鴉片的洋人而有所排斥，這種排斥的心態，一方面固然是競存態度的表現，一方面則強化了國人自我種

類的圖強意識，有利於近代中國民族主義思想的發展。

(二) 武備教育起了先導作用

武備教育思想肇始於清道光年間，光緒以後，武備教育思想的倡導益為積極，尤其光緒26年（1900）義和團之亂，八國聯軍之役，舉國遭逢鉅創，受盡凌辱，朝野上下覺悟加深，圖強更切，武備教育的呼聲，乃響徹雲霄。不過，初期的武備教育思想，係以造就軍事人才及學習軍事技術為目的，顯然與軍國民教育思想的性質，略有不同。然而後期的武備教育思想，則除以教授軍事知識與技能外，對體能訓練及培養軍人氣質，已相當重視。這與以培養軍國民為目的的軍國民教育思想，自較為接近。就此觀點而言，武備教育思想的發展，可以說是對軍國民教育思想起了先導作用，應不過言。

進一步而言，從武備教育的發展過程看，約可分四個階段。亦即，第一階段，自同治元年（1862）同文館設立始至同治11年（1872），曾國藩、李鴻章，因容闈建議，奏派幼童赴美學習各種軍事有關學科止，為武備教育的萌芽期。主要以派遣留學生學習天文、數學、製造軍事武器為目的。第二階段，為光緒2年（1876）李鴻章奏派武弁卞長勝等赴德

國學習陸軍開始，至光緒7年（1881）李鴻章、沈葆楨奏派福建造船廠學生赴英國、法國學習航海術及造船術為止，重在軍事武器及人才之培養，尤以海軍人才之養成為重點。第三階段，為光緒11年（1885）李鴻章奏請於天津設立武備學堂始，至光緒21年（1895），張之洞奏請於武昌設立武備學堂止，重在設立武備學校，培養陸軍人才。第四階段為光緒21年（1895）起至光緒28年（1903），多數朝廷官吏皆重武備教育，為武備教育思想之全盛時期。⁽³²⁾

武備教育思想發展到第四階段，已不僅止於軍事技術的學習，甚至在自行培養軍事人才的内容與範圍，已有逐步擴展的跡象。如張之洞於光緒21年（1895）奏請設立武備學堂的摺中明言：

整軍禦侮，將材為先，德國陸軍之所以甲於泰西者，固由其全國上下，無一不兵之人；而其要尤在將領營哨各官，無一不由學堂出身，故將材稱盛。今欲倣德制，練成勁旅；非廣設學堂，實力教練，不足以造就將才。」⁽³³⁾

張之洞對德國陸軍之仰慕，在於德國「全國上下，無一不兵之人」，且「無一不由學堂出身」，因此，競相派遣學生赴德國學習軍事，或廣設學堂，邀請德人來華擔任教席，使能一如德國軍人，個



中心論題



個嚴守紀律，堅忍卓絕，勇敢善戰，而「甲於泰西」。

就張之洞創辦的湖北武備學堂教材而言，類多模仿德國。如「湖北武學」乙書(34)，共分六卷，其中五卷為德國兵式體操，原為德國軍事訓練教材，內分空手體操、運槍體操、用架體操、越險阻體操和體操設備與建築，係由來華任教的德國軍官與我國教師共同譯著，註明為：「德國武備原本」，足見德國武備體操在清末武備教育中之地位。

按湖北武備學堂，係張之洞任湖廣總督時，于光緒21年(1895)設立。學生資格「專選文武舉貢生員及文監生文武候選員弁以及官紳世家子弟，文理明通，身體強健者」入學肄業。其課程分學科與術科。學科稱講堂功課有軍械學、算學、測繪、地圖學、各國戰史、營壘橋道制造之法和營陣攻守轉運何要術科稱操場功課含槍隊、炮隊、馬隊、營壘工程隊、行軍炮台、行軍鐵路、行軍旱雷、演試測量、演習體操等」各科教材都按照洋教習，講說課程譯成華文華語轉述體操內容。

當時，張之洞特電請駐德大使向德國兵部商聘精通武學之二洋員，擔任教師，德國政府應聘指派法勒根漢和根次二人到湖北武備學堂執教。由于洋

教師不夠，張之洞再從由他在光緒21年(1895)籌建的江南自強軍德國軍官中商調三人，經過法勒根漢的挑選，聘斯泰勞任教職，瑞乃爾派入擄軍營洋操隊教練弁勇。國內則遴選津奧學堂出身，久充教習者數華員為領班。關於課程設置及教材，全由德國教師會商釐訂，報張之洞審核裁定。

細查德國兵式體操的內容，則包含了田徑的走、跑、跳躍；體操的單槓、徒手操、獨木橋、攀登；軍事訓練的槍操、武裝超越障礙等。基此，不難了解清末武備教育的後期，軍事訓練的內容，已納入了大量近代體育活動項目。就這點而言，已與軍國民教育的性質更為接近。換句話說，在理念上，德國「無一不兵」的現實，使得人人皆兵的思想，在清末也初露端倪，武備教育，也隱隱約約逐步跨出了僅學習軍事技術的有限範圍。

光緒27年(1901)，張之洞與劉坤一會奏變法自強第一疏，更力陳各級學校應注意體操，並應設兵隊操場，他說：

「臣等謹參酌中外情形，酌擬今日設學堂辦法，擬令州縣設小學校及高等小學校。……十二歲以上，入小學校，習普通學，……習柔軟體操，三年畢業……十五歲以上，入高等小學校，……習器具體操，



：此學必設兵隊操場，三年畢業，：府設中學校，十八歲高等小學校取畢業為附生者，入中校，學習普通學。：習中國歷史兵事，：習兵式體操。」：此學亦必設兵隊操場，三年畢業，：省城應設高等學校一區：擬參酌東西學制，分為七專門：五兵學，外國戰法學、軍械學、經理學、軍醫學皆屬焉。：共七門，各認習一門，：亦三年而畢業，：無論何學，皆有兵隊操場：。」(35)張氏注重體能訓練和軍事操練由此可見。

張之洞結合體能與軍隊操練，作為練兵的主要內容，說明了這個階段的武備教育，不止突破單純軍事技術訓練的層次，更顯示了體格、體能訓練，在武備教育中取得了重要位置，體現了武備教育在軍國民教育中的先導作用，並為人人可為兵的思想中，提供了軍國民教育體育思想的萌芽土壤與成長機會。

註

1. 嚴復「原強」修訂稿，本文係據「侯官嚴氏叢刊」所刊的修改稿。修改稿與原本相較，不僅文字上有很大改動，而且補寫了很多內容，增添了將近一半的文字。見王棧主編 嚴復集 第一冊

中華書局 1986 P.26。

2. 同上註 P.18。

3. 阿克德美為 Academy 之音譯，津蒙那知安則為 Gymnasium，或譯為體育館或體操操場。

4. 嚴復譯 群學肄言 台灣商務印書館 1970 P.172。

5. 梁啟超 新民說十九（第十七節論尚武） 新民叢報 第28號 1903 P.

6. 梁啟超 前揭書。

7. 梁啟超 前揭書。

8. 引自鄭世典 梁啟超教育思想之研究 師大學報 第11期上冊 1966 PP.184-185。

9. 蔣松卿 譚嗣同與體育 體育史論集(三) 1987 PP.140-144。

10. 譚嗣同 仁學卷上 譚嗣同全集 華世 出版社 1988 P.37。

11. 譚嗣同 前揭書 P.40。

12. 譚嗣同 前揭書 P.42。

13. 譚嗣同 前揭書 P.36。

14. 同註9，P.141。

15. 論欲救中國當表章顏學習齋說 神州日報 1907年10月17日，又見東方雜誌4：12，光緒33年12月 PP.10953-10957。



中心論題



16. 鄭佩昂 新青年 3:5 1917 PP.520-521。
17. 嚴復 保種餘文 前揭書 P.87。
18. 同上註。
19. 同上註。
20. 梁啟超 禁早姻議 新民叢報 第23號 1902
收錄「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 1975 P.685。
21. 梁啟超 禁早姻議 新民叢報 第23號 1902
收錄「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 1975 P.685。
22. 梁啟超 禁早姻議 新民叢報 第23號 1902
收錄「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 1975 P.685。
23. 梁啟超 禁早姻議 新民叢報 第23號 1902
收錄「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 1975 P.687。
24. 梁啟超 禁早姻議 新民叢報 第23號 1902
收錄「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 1975 P.687。
25. 梁啟超 禁早姻議 新民叢報 第23號 1902
收錄「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 1975 P.687。
26. 嚴復 前揭書 P.23。
27. 鮑家麟 辛亥革命時期的婦女思潮(1898-1911)
中國近代現代史論集 台灣商務印書館 1986
P.936。
28. 張尚書不纏足會敘「知新報」第32冊 光緒23年
6月1日，收錄「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
PP.847-849。
29. 鮑家麟 前揭書 P.941。
30. 王爾敏 清季知識分子的自覺 近代史研究所集
刊 第二期 1973 P.10。
31. 王爾敏 清季知識分子的自覺 近代史研究所集
刊 第二期 1973 P.9。
32. 鄭世興 我國近代軍國民教育思想及其影響之研
究 國科會獎助作品 1972 PP.63-71 (未發表
)。另見：舒新城著 錢歌川譯 近代支那教育思想史 中華書
局 1930 PP.39-49。
33. 鄭世興 前揭書 P.66。
34. 姚廷華 一部使空白屬於過去的教科書—清末「湖
北武學」評介 中國體育史論文集(五) 1989
PP.203-214。
35. 舒新城 中國近代教育史料 第一冊 商務印書
館 1930 PP.82-83。